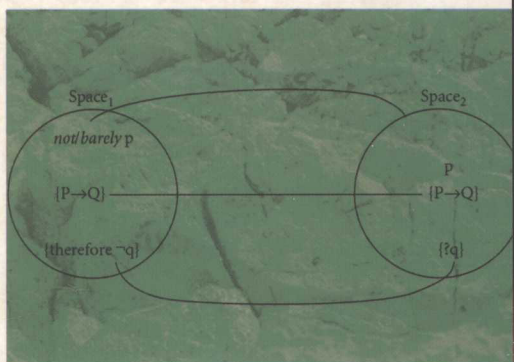


西方语言学前沿书系

认知语言学丛书



[荷兰] Arie Verhagen / 著

交互主观性的构建： 句法与交际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方语言学前沿书系

认知语言学丛书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

**交互主观性的构建：话语、
句法与交际**

[荷兰] Arie Verhagen

文旭 高莉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互主观性的构建: 话语、句法与交际: 英文/(荷) 费尔哈亨著.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 3

(西方语言学前沿书系. 认知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5100-7792-0

I. ①交… II. ①费… III. ①语言交流—研究—英文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7538 号

© Arie Verhagen 2005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Adapt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交互主观性的构建: 话语、句法与交际》原于 2005 年用英文出版。本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销售。

交互主观性的构建: 话语、句法与交际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

著 者: [荷兰] Arie Verhagen

导 读: 文旭 高莉

责任编辑: 梁沁宁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 12

字 数: 334 千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7792-0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7-4656

定 价: 38.00 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西方语言学前沿书系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 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文 旭	文秋芳	方 梅	石 锋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朱庆之	任绍曾
刘丹青	刘振前	齐振海	江 荻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柏令
李战子	吴海波	吴福祥	岑运强	何自然
汪国胜	沈 阳	张 博	张伯江	张德禄
陆丙甫	陆汝占	陈永明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姚小平	袁毓林	顾曰国	钱 军
郭 锐	高一虹	高立群	黄国文	曹广顺
崔 刚	崔希亮	彭宣维	董秀芳	程 工
程晓堂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策划 郭 力

西方语言学前沿书系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冯胜利	朱晓农
刘勋宁	孙景涛	张 敏	张洪明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交互主观性的构建：话语、句法与交际》导读

文旭 高莉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是一个从外部客体世界向内部主体世界转移的过程，具有自我意识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随着语言学研究中“人文主义”的复苏，尤其是随着强调语言使用的语用学、强调语言功能的功能语法，以及强调人类认知在语言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语言“主观性”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即人们从最开始思考语言与外部世界的简单对应关系转向了思考人作为认知主体在语言中所起的作用。较早从语言角度对主观性进行阐释的是法国语言学家 Benveniste，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指出：“语言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每一位说话者在话语中通过‘I’指称自我将自己确立为主体。主观性是说话人将自己看做‘主体’的能力，‘自我’（ego）就是说‘自我’的人，主观性的基础在于语言的使用，是由人的语言身份决定的。”（Benveniste, 1971）通过对英语中人称代词、时间表达、某些动词类（如心理操作词、具有社会意义的个人行为动词）等体现主观性的语言形式的讨论，Benveniste 向人们展示了主观性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在 Benveniste 之后，对语言主观性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 Lyons（1982, 2000）、Langacker（1985, 1990, 1999, 2006）、Traugott（1995, 2002, 2004, 2010）、Nuyts（2001）、Ikegami（2005）、Verhagen（2005）、Smet & Verstraete（2006）、Iwasaki（2010）等。1995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D. Stein 和 S. Wright 主编的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一书是一本较早的专门讨论主观性和主观化的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里 E. Finegan 总结了主观性和主观化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影响语言表达式的言语主体的视角、言语主体对话语中所包含命题的情感表达、言语主体对话语中所包含命题的情态或认

识状态表达。例如, Langacker 对主观性的研究主要是共时平面上表达式所反映的言语主体的视角问题。E. C. Traugott 还完善了她有关意义变化单向性的假设, 指出表达式的意义遵循着越来越依赖说话人对命题主观信念或态度的变化趋势, 即从非主观性到主观性。

在 2004 年的论文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以及 2010 年的论文 *Subjectific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中, E. C. Traugott 进一步丰富了她的单向性假设, 指出主观化了的意义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出交互主观性意义, 即编码说话人/作者对听话人/读者认知状态和社会身份的意义。例如 “let’s” 由表示说话人提议的主观性意义进一步发展出表示说话人对听话人关照的交互主观性意义, 典型例句如 “Let’s take our pills now, Roger.” (Traugott, 2004)。可以看出, Traugott 对交互主观性的探讨是对 Benveniste 交互主观性的进一步发展, 即语言交际中作为言语主体的参与者不仅能够意识到同样作为言语主体的交际对方的存在, 而且表达出对交际对方认知 ‘自我’ 和社会形象 ‘自我’ 的关注。Nuyts (2001) 从证据状态入手, 认为如果证据为包括说话人在内的一群人所共知, 由此得出的结论为大家所共享, 体现交互主观性; 如果说话人独享证据, 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 则体现主观性。这种交互主观性强调信息的共有性, 即共主观性, 与 Traugott 所强调的语言形式的不同意义编码有所区别。

以上有关语言交互主观性的探讨主要散见于单独发表的论文和论文集中收录的单篇论文, 而 A. Verhagen (2005/2007) 的专著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mmunication* (《交互主观性的构建: 话语、句法与交际》) 则是一本专门论述交互主观性的著作, 此书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Verhagen 是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中心的教授, 研究专长是认知语言学。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曾经发表过有关主观化、句法与交际的文章 *Subjectification, syntax, and communication*, 主要强调在分析语言现象时语义分析、句法分析和话语分析三种研究视角的互补性。十年之后, Verhagen 教授从人类交际的大背景出发, 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研究论述了语言系统中表达式的交互主观性本质, 强调自然语言中有些表达式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协调说话人/作者与听话人/读者就某一概念化客体的认知立场, 而并非对客体的简单描述。他分析的语言现象主要

包括否定 (negation)、小句补语成分 (clausal complements)、连接词 (connectives)。与 Traugott 有所区别, Verhagen 更多地关注交际双方之间认知状态的管理, 而不是语言编码的不同。

全书共五章, 第1章建立理论框架并解释理解全书内容的一些基本术语, 第2至4章分析具体语言现象, 第5章为结语部分, 总结前面几章的内容并指出后续研究方向。

第1章: 交互主观性——认知状态的相互管理

第1章阐释交互主观性方法的理论基础并说明相关概念。Verhagen 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 为什么表达式 *It is not impossible* 和 *It is possible* 相互蕴涵, 但在实际语言使用中它们功能上却不对等? 为什么一个世纪以来语法学家们对句子 *The danger is that depleted uranium is poisonous* 中的嵌入小句 *that depleted uranium is poisonous* 到底是句子的主语还是谓语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让步连接词 *although* 看似因果连接词 *because* 的否定对等, 对因果关系的否定可以产生让步解读, 如 *John is not the best candidate because he happens to have a Ph. D.* 可以表示“尽管约翰拥有博士学位, 但他不是最佳候选人”这样的意思, 但对让步关系否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即 *John is not the best candidate although he happens to have a Ph. D.* 不可能表示“约翰拥有博士学位是他不被认为是最佳候选人的原因”的意思, 这又是什么? 对这些具体语法、语义问题的理解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语言的假设, 尤其是对意义的假设。传统语义学将语言与外部客观世界联系起来, 强调表达式的意义在于对客观世界的描述, 而不是那些依赖语境的推理性意义。Verhagen 从 Anscombe 和 Ducrot 的“论辩理论” (the theory of argumentativity) 出发, 认为人类语言除了有交换信息的功能之外, 还有对他人进行调控和评价的功能, 而且这种功能是更为基本的、第一位的, 描述性功能则是第二位、衍生的, 毕竟说话人/作者参与言语交流归根结底是想要影响别人的思想、态度或引起对方一个即刻行为反应。正是在这种与传统假设截然相反的对意义理解的基础上, Verhagen 提出了解释上述三种语言现象的新视角, 这也就是他在书中所说的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那么这种对语言及其意义的理解又是如何镶嵌于人类交际的大

背景中的呢？学者们的相关研究表明人类语言系统区别于其他动物交际系统的特征之一是人类语言符号的形式与其功能之间的约定俗成性，这种约定俗成性预设了交互主观性，即语言符号有它的交互主观性基础。发展心理学家 Tomasello 对社会认知的研究表明，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包括灵长目动物），是因为人类有从他人视角看问题的能力。因此，人类不仅可以通过自身与世界直接接触来了解世界，还可以通过他人（他人的观点）间接地了解世界。人类这种理解别人的基本能力，使自己不仅成为“意识主体”（intentional agents），而且成为“心理主体”（mental agents），这也是其他认知能力发展的前提条件（见本书 2-3 页）。人类语言作为基本的约定俗成体系，是同一文化的人们所共享的，语言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学习而不是遗传获得的。与同类认同的能力在人类社会学习尤其是语言学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对人类语言符号系统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基本语言单位的语义成分应该包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人类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的认知处理。揭示语言如何帮助实现这种认知处理，即揭示人类与他人进行“认知协作”（cognitive coordination）的能力是如何在语言中得以体现的，这是 Verhagen 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

Anscombe 和 Ducrot 的“论辩理论”是理解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该理论认为普通表达式有它的论辩潜能，能为某种特定结论提供论据，这是表达式不变的功能，而表达式的信息值却是易变的（见本书 10 页）。例如：

- (1) John is handsome.
- (2) But I don't like him.
- (3) But I like him.

考虑到对话语意义的理解必须将其置于上下文中进行分析，即要分析它与前后话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当说话人说出含有“handsome”一词的句（1）时，我们不能只考虑它与外部世界中“John”之间的关系，而是要通过上下文多个话语之间的连贯关系理解其意义。（1）与（2）结合连贯，与（3）却不连贯。因为，基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约翰长得帅”一般可以推出“受人喜欢”的结论，即表达式“约翰长得帅”为结论“他受人喜欢”提供了论据。因此，

“handsome”一词的意义是它为话语所提供的论辩潜能。这里涉及了“特定文化模型”(topos, 复数 topoi)的概念,即说话人与听话人共享的模型,它是一种“缺省规则”(default rule),不是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universally valid)的规则(见本书12页),即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享有不同的文化模型。“特定文化模型”是 Verhagen 交互主观性方法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正是基于这种共享模型,听话人对话语进行某种推理,从而得出特定结论。如果缺乏这种共享知识,说话人与听话人进行认知协作以达到对特定概念化客体的认知平衡是难以实现的。Verhagen 认为,成功的交际不仅仅是交际双方对同一概念化客体的关注,而是听话人理解说话人想让其作出何种推论。

作为分析工具,Verhagen 在第一章中引入了 Langacker 的“识解构型”(construal configuration)和 Fauconnier 的“心理空间”(mental spaces)理论。“识解”是 Langacker 认知语法中的重要术语,强调人类构思和描述相同情景的不同能力,识解构型展示了概念化主体(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与概念化客体之间的识解关系。Verhagen 认为,Langacker 的构型没能反映出人类的特殊认知能力——相互间的认知协作,他对其进行了修改,拓展出概念化主体层面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认知协作。可以看出,Langacker 关注的是概念化主体如何对概念化客体进行识解,而 Verhagen 关注的是概念化主体间如何进行认知协作以达到对概念化客体的识解平衡。这也分别对应于 Verhagen 在书中提到的两种主观性,一种体现为概念化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识解可能有别于客观世界本身,另一种体现为概念化主体之间关于客观世界的观点可能是不同的(见本书4-5页)。这种包含了概念化客体、客体间关系(由不同情景A和B构成时)、概念化主体、主体与客体间识解关系以及主体(说话人)与主体(听话人)间认知协作关系的基本识解构型是后面章节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工具(见本书7页,图1.2)。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每一个表达式都会以语言符号标记此识解构型中的所有方面,不同表达式突显的是不同方面。例如,打招呼用语“Hi”突显的是基本识解构型中概念化主体间的关系,不涉及概念化客体层面,而“数词”的意义不涉及概念化主体层面,是“纯客观”的表达式。当然,这两种情况是极端的例子,语言使用中大多数表达式的意义识解都既涉及概念化客

体层面又涉及概念化主体层面。Fauconnier 的“心理空间”理论是自然语言意义建构方面的重要理论,它可以很好地解决形式语义学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在本书中用于分析像否定词、接连词等心理空间建构词的心理空间建构作用。

第1章最后介绍了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本书采用的是“基于使用的方法”(a usage-based approach),强调语言知识建立在语言使用者从语言使用事件中进行概括、归纳的基础上,这是认知语言学三个重要理论假设之一。基于这种假设,本书中的语料既有来自于语料库(荷兰语和英语)的基于使用频率的实例,又有实际语言使用中的单例,还有作者自己虚构的例子和一些直觉性例子(母语使用者一致认可的)。丰富多样的语料从不同方面支撑了作者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2章:否定与实际论辩

第2章用交互主观性方法阐释否定表达现象。Leech (1983)曾在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一书中指出,因为与肯定句相比,否定句需要更多的加工时间和加工努力,所以当说话人选择使用否定句而不是肯定句时,他/她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说话人使用否定句的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否认与它相对应肯定句所陈述的命题,即说话人认为语境中某人(可能是说话人)或许持有某种观点或认识,通过使用否定句说话人想要对这一命题予以否认。Israel (2004/2006)认为一个人通常不会否认某事,除非他/她认为某人或许相信此事,他引用 Strawson 的话来强调表达观点的正常方式是肯定,否定则属于有标记范畴,即“not 的规范和主要用途是否认或者修正;取消某人自己或其他人的建议”。

Verhagen 从他的交互主观性方法出发,认为自然语言中否定的功能主要不是关于语言与世界或语言使用者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概念化主体间的认知协作问题。他分析的现象包括句子否定和形态否定、Let alone 构式、论辩操作词 barely 与 almost、双重否定等。说话人/作者使用句子否定的目的是指导听话人/读者构建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这两个空间是关于同一命题的截然相反的“认识立场”(epistemic stance),听话人/读者进行推理后接受其中一个,

放弃另外一个。例如, Mary is not happy. On the contrary, she is feeling really depressed. 初看这个句子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on the contrary” 之前和之后的小句都表示“玛丽不高兴”的意思, 为什么要用“on the contrary”(表示“相反”的意思)来连接? 理解的关键在于“Mary is not happy”中的否定词“not”向听话人/读者开启了另一个心理空间“Mary is happy”, 与“she is feeling really depressed”相反的恰恰就是“Mary is happy”这一空间。而形态否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Mary is unhappy. On the contrary, she is feeling really depressed. 不是一个连贯的句子, 因为“unhappy”只是从“高兴”等级的一端走到了与之对应的另一端, 而并没有建立起另一个心理空间, 因此, 句中的“on the contrary”没有与之联系的心理空间。从本书的理论框架出发, 可以说句子否定主要是概念化主体间的认知关系操作, 而形态否定主要是在概念化客体平面的操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It is not impossible.”与“It is possible.”相互蕴涵, 却在语言使用中功能上并不对等。

在分析 barely 与 almost 时, Verhagen 提到了论辩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论辩方向”(argumentative orientation/argumentative direction)和“论辩力”(argumentative strength), 前者是正值或负值的二元区分, 后者是由高到低的连续统。“barely”与“almost”的论辩方向截然相反, “barely”是比直接否定论辩力弱, 但和直接否定一样是逆转话语论辩方向的操作词, “almost”比没有使用模糊限制语的直接陈述的论辩力弱, 但和直接陈述一样为某种结论提供肯定论据。因此, 句子“He barely succeeded. So there is hope that he make it through next time.”不连贯, 而句子“He almost succeeded. So there is hope that he make it through next time.”却是连贯的。再如, “no chance”和“little chance”的论辩方向一致, 都指向负值, 即否定词“no”和“little”的使用逆转了与“chance”有关的推论方向, 但后者的论辩力要弱于前者。而“little chance”与“a small chance”的论辩方向截然相反, 即后者维持了与“chance”有关的推论方向, 虽然“little chance”与“a small chance”实际所指机率有可能完全相同。这些都说明否定词或构式的意义更多地与话语的论辩值有关, 而不是与话语的信息值有关, 即自然语言中的否定表达具有以论辩性为其特征的交互主观性功能。

在第2章最后,作者总结指出,正是这种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区分了概念化主体间的认知协作和概念化主体对概念化客体的识解,才使我们解决一些实际语言使用现象。例如,像“almost”不能出现在“let alone”构式第一个并连语中的句内语法现象;语篇结构中依据论辩操作词、连接词及其相互作用准确判断回指词的先行项问题;使用像“not impossible”、“not unhappy”等句子否定加形态否定形式产生不同语境效果的问题。

第3章:限定补语——使概念化者登上舞台

第3章是用交互主观性方法阐释限定补语问题。传统语法以简单句为结构模型分析补足构式,认为由小句充当补语的复杂句与由名词短语充当补语的简单句拥有相同的句法成分,并以抽象的语法概念如主语、宾语等来分析补足构式的语法功能。在这种抛开语篇而对句子进行独立考察的做法下,“Bob knew something.”和“Bob knew that his mother would come back at seven.”两个句子具有相同的结构,都是对“knowing”事件的描述。Verhagen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下小句可以出现在补语的位置,而名词短语却不能;同样,这种把补语小句(complement clause)和主句间关系看做一种附属关系的观点与来自语篇研究和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方面的结果并不相符。

在通过实例展示了补语小句在语篇结构中的作用不同于传统语法中的附属小句后,Verhagen提出补足构式应当被看做以其独特方式协调概念化主体间认知状态的构式家族成员,也就是说补足构式的主要功能不是对概念化客体的描述,而是指导听话人/读者以“主句/带补语的小句”(matrix clause/CT-clause)指定的方式与另一概念化主体对补语小句所表示的概念化客体进行识解上的认知协作(见本书97页)。补足构式通过使不同的概念化者登上舞台,以语言形式反映了人类与同类认同的能力,即补足构式是人类作为意识主体和心理主体相互之间认同的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具体体现,递归性则是这种基本认知能力的内在特征。用交互主观性观点阐释补足构式既适用于传统语法中被认为是主句宾语的补语小句,例如“Bob knew that his mother would come back at seven.”也适用于传统语法中

被认为是句子主语的补语小句, 例如 “That he will pass the exam is obvious.” 或者 “It is obvious that he will pass the exam.” 只不过前者是补足构式家族中的典型成员, 而后者是其延伸, 属于非典型成员罢了。为了与话语场景中固有的概念化者区分开来, 主句中明确提及的概念化者被称为“前台概念化者”(onstage conceptualizer)。这样一来, 补足构式就是邀请听话人/读者与前台概念化者、最终与说话人/作者进行认知上的协作。前台概念化者为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和“非视角化”(non-perspectivized)(没有前台概念化者)时, 补足构式的论辩方向是一样的, 但论辩力是依次递加的。即前台概念化者为第三人称时, 补语小句与概念化主体间的关系最为间接, 毕竟第三人称的视角可能有别于说话人/作者, 而说话人/作者的视角又有可能有别于客观世界, 只有非视角化的表达直接将概念化客体引入到概念化主体共享的心理空间中, 因此, 它的论辩力是最强的。

基于对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考虑以及荷兰语语料库中使用情况的频率分析, 作者用“构式图式”(constructional schema)论述补足构式的形式和意义(见本书101页、135页), 并建立了一个荷兰语补足构式网络(见本书138页), 处于此网络中心位置的是典型的补足构式成员, 其主句谓语动词主要是表达意识主体心理状态或过程的“心理空间建构语”(mental-space builders), “非人称视角化”(impersonal perspectivization)是补足构式的延伸, 而表达因果关系的主句动词, 如 be due to, see to it, be thanks to, is to be blamed to 等, 则是补足构式的极端延伸。由此看来, 主句动词的词汇意义可以说是起到了操作不同概念化者之间关系的作用, 从而使说话人/作者可以表达与前台概念化者视角不同的认同程度。

用交互主观性方法阐释补足构式可以将一些语言现象统一起来。Verhagen 在本章中还分析了诸如 “What do you think he said?” 的 wh-提取现象(或称为长距离 wh-移动), 认为它同样属于补足构式家族中的一员, 其中的 “do you think” 通过将听话人/读者置于前台而在交互主观性维度上起作用。另外, 语言学和哲学领域传统认为句子 “I think it is raining.” 和 “John thinks it is raining.” 属于不同类型的话语, 前者为主观性/行事话语, 后者为客观性/述事话语(参见 Verhagen, 2008: 324)。在这种二分法下, 人们不明白为什么相同的结构会表达不同的功能? Verhagen 在本书中提出的交互主观性框架

则可以将这些现象统一起来,不管是“I think...”还是“John thinks...”都是在语言使用同一维度上的操作,即听话人/读者与另一概念化主体之间认知协作的维度,只不过比起前者来说,后者表示听话人/读者与说话人之间的认知协作是间接的。

第4章:话语连接——跨视角管理推理

第4章是用交互主观性方法阐释话语连接词的问题。作者分析的概念化客体是由两个小句以语言形式体现的两种不同情景A和B。话语连接词(包括并列连词、附属连词以及其它标记语段间概念关系的常规语言形式)可以标记情景A、B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也可以标记它们之间存在的主观关系。前者是Verhagen识解构型中概念化客体层面(O平面)的操作,后者则是概念化主体层面(S平面)的操作;前者体现了Sweetser“域理论”(domain theory)中的“内容域”(content domain),后者体现了“认识情态域”(epistemic domain)。例如,句子“The water freezes because the temperature is very low.”标示的是情景A与B之间的“客观”关系,是连接词“because”在内容域的用法,而句子“The temperature is very low because the water freezes.”标示的是概念化主体对客体A、B间关系的主观识解,是连接词“because”在认识情态域的用法。Verhagen对作为跨视角推理管理者的话语连接词的讨论是围绕因果连接词与让步连接词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句子“The house is no less comfortable because it dispenses with air-conditioning.”可以理解为是句子“The house is no less comfortable, although it dispenses with air-conditioning.”的意义对等句,这说明因果连接词与让步连接词之间有紧密的概念联系。Verhagen认为König等学者对这两类连接词意义的阐释无法解释因果连接词与让步连接词之间的功能不对等现象,即为什么对因果关系的否定可以产生让步解读,而让步关系却不可能被否定,更不用说产生因果解读了。虽然Sweetser的“域理论”提出用不同的概念域区分情态动词、连接词等的不同用法,但正如Verhagen所说的那样,像“but”、“although”之类的连接词具有内在的认识情态性是无法解释句子“John failed his exams although he worked hard.”与“John lounged

around, although he passed his exams.”之间的区别的,这说明 Sweetser 的“域理论”也无法令人满意地阐释连接词的具体使用。

Verhagen 认为交互主观性理论是一种更好的分析方法,它可以运用“论辩方向”、“特定文化模型”等概念更好地解释这些连接词的概念连接作用。让步连接词 *although* 的使用不仅涉及一般性的、缺省原则 (topos) 与单个的、特定命题之间的不同,还涉及不同概念化主体之间视角或心理空间的协调。“*r although p*”中“*although*”的使用投射了另一心理空间 $Space_2$, 命题 *p* 在 $Space_1$ 和 $Space_2$ 中同样有效,在 $Space_2$ 中听话人/读者基于说话人/作者与自己共享的“特定文化模型”(根据命题 *p* 可以推出命题 *q*) 推出结论 *q* (这种由因到果的推理表明因果关系与让步关系之间的联系),说话人承认听话人这一推理的有效性,但通过 $Space_1$ 中 *r* 的陈述说话人表示了对结论 *q* 否定的认识立场,也就是说他邀请听话人修正关于结论 *q* 肯定的认识立场(见本书 169 页)。“*although*”与“*but*”的区别正是表现在这种管理听话人推理过程的交互主观性协作维度上,“*although*”的使用取消的是“*p although q*”中与 *q* 相关的结论,而“*but*”的使用取消的是“*p although q*”中与 *p* 相关的结论。因此,句子“John failed his exams, but he worked hard. So let's give him his birthday present anyway.”可以接受,但句子“John failed his exams, although he worked hard. So let's give him his birthday present anyway.”却不符合常理。这也就是为什么 Verhagen 发现荷兰语 Eindhoven 语料库中有 55% 的让步小句出现在主句之前的原因:说话人先认可一个共享的知识及推理,再陈述他/她实际想让听话人接受的命题,而不是先陈述命题,再承认另一推理的有效性而不接受其后果,后一种方式实际上削弱了说话人想让听话人接受的命题。可以看出,让步连接词总是在 *S* 平面上的操作,即认识情态域的操作,其出现一定会建立起拥有不同认识立场的心理空间,它固有的意义就是协调概念化主体对概念化客体的识解,是说话人向听话人表明双方所共享特定文化模型不适用于正在谈论情景的具体语言体现。例如,句子“John did not pass the exam although he worked hard.”中“*although*”的使用,暗示说话人向听话人表明双方所共享的文化模型“Working hard makes passing more likely.”不适用于“John”的情况。这与句子“John did not work hard, although he passed the exam.”之间的区别在

于：在前一句话中说话人推翻的是一种直接因果关系推论，即由“John worked hard”推导出的“John must have passed the exam”，它是“内容”上的推理，而在后一句话中说话人推翻的是根据“John passed the exam”得出的“John must have been working hard”的推论，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溯因推理，是“认识情态”上的推理（见本书180-181页、183页）。这也就回答了 Verhagen 在第174页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虽然让步关系都是在认识情态域的操作，但为什么实际使用中却存在看似不同的“内容域”和“认识情态域”两种用法？

因果连接词 *because* 既可以标示情景 A 与 B 之间的“客观”关系（说话人与听话人共享和接受的信息），也可以标示其主观关系。当标示主观关系时，*because* 触发了一个心理空间构型，其中说话人预见听话人可能持有对所陈述命题不利的认识立场，通过 *because* 小句说话人为命题提供论据。这种能触发另一心理空间的因果连接词与让步连接词一样，都是协调概念化主体间的认知识解，是在交互主观性层面的操作。可以看出，与让步连接词不同，因果连接词不一定总是触发拥有不同认识立场的心理空间，这才使它可以出现在否定的管辖范围之内而产生一种让步解读；相反，让步连接词却不能出现在否定的管辖范围之内而产生一种因果解读，因为说话人不可能在同一心理空间中既宣布某一推论的无效性，又同时对这一宣布进行否定。这就回答了 Verhagen 在第174页上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是第一章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本章最后还对荷兰语中的因果连接词进行了考察。通过对使用中分布规律以及与否定相互作用的分析，Verhagen 发现荷兰语中有些因果连接词的部分固有意义就是对概念化主体间关系的约束，如 *want*（相当于英语中的“*because*”），*dus*（相当于英语中的“*so*”），*aangezien*（相当于英语中的“*since*”），而像 *daarom*（相当于英语中的“*therefore*”或“*that's why*”）和 *omdat*（相当于英语中的“*because*”，但限定动词出现的位置与“*want*”中不同）则不包含对概念化主体间关系进行约束的固有意义，至于连接词“*daardoor*”（相当于英语中的“*as a result*”），它的固有意义根本就不激活概念化主体这一概念，它只是概念化客体层面的操作，突显情景 A 与 B 之间本身的关系，而不像其他连接词可以同时突显概念化主体与客